

我国西南地区与南亚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联系

——以卡若文化与梅尔伽赫文化为例

俞方洁¹ 李勉²

(1. 四川美术学院 公共课教学部; 2.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 重庆 401331)

摘要:新石器时代我国西南地区与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地区已有了文化交流。通过对西藏卡若文化与南亚俾路支斯坦地区梅尔伽赫文化、克什米尔地区布鲁扎霍姆文化、古夫克拉文化的文化互动考察,发现卡若文化的陶器刻纹、衬花工艺、海贝加工技术与梅尔伽赫文化关系密切。梅尔伽赫文化并未对卡若文化产生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喜马拉雅山廊道向西藏渗透,卡若文化与克什米尔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互动关系就说明了这条文化交流通道的存在。

关键词:卡若文化;梅尔伽赫文化;布鲁扎霍姆文化;衬花陶;海贝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18)06-0033-08

我国西南地区与南亚次大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联系最早见于上世纪80年代童恩正先生的研究,他在《西藏考古综述》一文中提及西藏卡若遗址与克什米尔布鲁扎霍姆(Bruzahom)遗址之间存在相似性^[1]。此后,霍巍先生综合比较了布鲁扎霍姆与卡若遗址后认为两者在文化内涵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寻找布鲁扎霍姆早期文化的源头应考虑卡若文化以及相邻中国西南山地的新石器文化^[2]。意大利学者斯塔克·杜齐先生(Giorgio Stacul)也注意到克什米尔斯瓦特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半地穴居址、穿孔石刀、篮纹的陶器底并不属于印度河传统,而与包括青藏高原在内的泛喜马拉雅山脉关系紧密^[3]。吕红亮先生列举了卡若遗址与克什米尔地区新石器文化中诸多相似文化因素如玉珠和骨笄、系绳石刀等,为两者之间的文化联系补充了一些新的实物证据^[4]。不过,也有印度考古学家认为南亚次大陆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梅尔伽赫文化(Mehrgarh)才是布鲁扎霍姆文化的源头,而克什米尔地区的半月形穿孔石刀,可置于整个东亚传统的范围中^[5]。这也间接指明了梅尔伽赫文化与卡若文化之间可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鉴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卡若文化与梅尔伽赫文化作一番比较研究。

一、南亚梅尔伽赫文化序列

梅尔伽赫(Mehrgarh)遗址位于巴基斯坦俾路支斯坦喀奇平原(Kachi Plain)的博兰河河畔(Bolan River)。从地理位置上看,这里是连接伊朗高原和印度河平原的重要通道。1974~1985年,该遗址由法

收稿日期:2018-09-03

作者简介:俞方洁(1986—),女,重庆人,考古学博士,四川美术学院公共课教学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考古。

李勉(1987—),男,山东滨州人,历史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三峡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史。

基金项目:2016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我国西南地区与南亚古代艺术文化交流研究”(2016QNYS42)。

国考古学家贾立基(Jean-François Jarrige)主持发掘,共揭露了1650平方米,包括7个不同时期的地层堆积,文化延续时间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2600年^{[6]59-87}。梅尔伽赫文化大致可划分为三大主要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Ⅰ~Ⅲ期(7000BC~4500BC),新石器时期;第二阶段为Ⅳ期(4500BC~4000BC),铜石并用时期,虽然未发现熔铜堆的遗迹,但已在采矿点附近使用铜锭生产铜器;第三阶段为Ⅴ~Ⅶ期(4000BC~2600BC),前哈拉帕时期,出现了哈拉帕文化因素。

第一阶段:Ⅰ期为新石器时代的前陶期,分A-B两段,ⅠA为公元前7000至前6000年后半期,ⅠB下限在公元前6000年末期,以MR.3区为代表。陶器尚未发现,石器多为制作精细的几何形细石器、磨制石斧和石凿等。细石叶用沥青固定,装配在开有凹槽的木柄上作石镰。骨角器数量仅次于石器,有骨针、骨锥和骨刀等。装饰品有青金石、绿松石、滑石、玛瑙珠子和海贝手镯。它们大部分从遥远的外地输入,绿松石产于伊朗或中亚,天青石来自阿富汗,海贝来源于距海岸线400米的阿拉伯海岸。说明南亚已与临近的中亚地区建立了远距离的商贸联系。农作物有六棱大麦(*Hordeum vulgare*)、单粒小麦(*Triticum monococcum*)、二粒小麦(*Triticum dicoccum*)等。大麦比美索不达米亚早了一千多年,说明这里很可能是大麦最早的栽培中心之一。墓葬中有随葬羊的习俗。当地人虽然已驯化了山羊,但食物来源仍是野生动物如羚羊、鹿、猪、水牛等。

Ⅱ期为新石器文化萌芽期,公元前6000至前5500年,以MR.4区为代表。大麦是当地主要作物,出现了人工种植的棉花(*Gossypium*)。陶器为手制的低温红陶,大部分陶器在篮筐中成形,底部有篮纹,可辨别的有敞口钵、梨形陶罐、长颈壶等器型。彩陶用黑彩绘出简单的几何纹饰,以十字、菱形方格纹和V形纹最具特色。骨制品数量巨大,骨锥最多,依次为骨刀、骨针、骨锯。从动物骨骼来看,羚羊、山羊和绵羊等野生动物明显减少,驯化的瘤牛骨骼有了明显增长。

Ⅲ期为新石器文化鼎盛期,公元前5500年至前4500年,以MR.2区为代表。陶器广泛使用轮制技术,数量剧增,石器大为减少。陶器器型、组合与前期相同,彩绘陶纹饰更加丰富多样。陶器多绘有复杂几何纹构成装饰图像,如带阴影的菱形纹、三角纹、星点纹等。装饰品除了前两期的宝石外,还见铜制手镯、珠子、陶雕(瘤牛、羊)。宝石(玛瑙珠、绿松石珠、天青石珠)钻孔技术成熟。

第二阶段:Ⅳ期为铜石并用时期,以MR.1区为代表。陶器明显与第三期有继承关系,陶碗、深腹罐、杯等组合仍流行。彩陶出现了用黑色、白色和棕红色颜料上色的复杂几何纹,十字纹、群花纹、黑彩棕榈树等,这种多彩绘又称为奎塔风格彩绘(Quetta),这种风格与蒙迪加克Ⅲ期(Mundigak Ⅲ)类似。陶质男女人像、几何纹的陶印章也是这一时期文化的新内容。

第三阶段:Ⅴ期为前哈拉帕文化过渡期,接近公元前4000年,延续时间很短,发现遗迹、遗物相对较少。陶器占绝大比例,仍以平底器为主,包括罐、高脚杯、碗和盘,其中多彩带足高脚杯,内彩陶碗是这一时期显著特征。彩陶纹样如四瓣花、回字纹与伊朗东部和中亚地区非常相似,很可能受到了西边文化的影响。

Ⅵ~Ⅶ期,公元前4000年至前2600年。陶器批量生产,露天陶窑中摆放的陶器多达200件。陶器以实用器平底罐为主,新出现了带基座的碗、口杯等具有中亚文化特征的器型。彩陶纹饰多为带有浓郁的土库曼斯坦那马兹加(Namazga)文化风格,表明与中亚的联系更为紧密。大量制陶工具骨棍子的发现,进一步说明梅尔伽赫遗址可能是俾路支斯坦地区制作陶器的中心。铜和青铜数量有所增长,铜除了制成装饰品外还制成实用性工具如铜针、铜矛、铜勺等。红铜和青铜的化妆小瓶来自土库曼斯坦南部和阿富汗。大型陶塑人像以及青铜实用器具的发现也预示着印度河平原哈拉帕文化的出现。

二、梅尔伽赫文化与卡若文化的联系

卡若遗址位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县卡若村澜沧江与卡若水交界的台地。1978年和1979年经两次发

掘,揭露面积共1800平方米,文化堆积比较厚,约在100~160厘米。卡若文化可区分出早中晚三期,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结果,早期为公元前3296~3380年,中期为公元前2850~3030年,晚期为公元前2450~2580年^{[7]63-76}。从文化内涵上分析,卡若文化并非西南地区一支独立发展起来的原始文化。童恩正先生在报告中指出,卡若文化与我国甘青境内的马家窑、半山、马厂系统文化存在密切的文化交流。他认为:“卡若文化与马家窑、半山、马厂等文化在时代上基本是平行的,它们在文化内涵上的相似性,可能是因其有着共同的渊源,或者是互相影响的结果。其中有些文化因素,或许是来自黄河上游地区。不过像马家窑文化中的磨制条形石斧和石锛,半山文化中期出现的三角形彩绘等是否又是受到了卡若文化的影响,很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8]153}不可否认,卡若文化有诸多文化因素与甘青境内的马家窑文化非常相似,如罐、壶、碗、盆等平底器组合,三角折线纹、交互三角纹、菱形纹、涡纹、连弧纹等陶器纹饰,一侧镶嵌石刀的骨梗刀,鸟翼形石刀以及农作物粟米等。卡若文化中一部分文化因素应来自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如鸟翼形石刀、一侧镶嵌石刀的骨梗刀和农作物粟米。另一部分文化因素如三角形彩绘纹饰可能是卡若文化影响了马家窑文化。正如童先生所言,卡若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可能有着共同的渊源,而这一渊源恰好可以从梅尔伽赫文化中找到。从年代上来看,卡若文化早中晚三期的时间可对应梅尔伽赫文化的第三阶段Ⅵ~Ⅶ期,两者在文化内涵上也有一些相似之处。

(一) 陶器刻划图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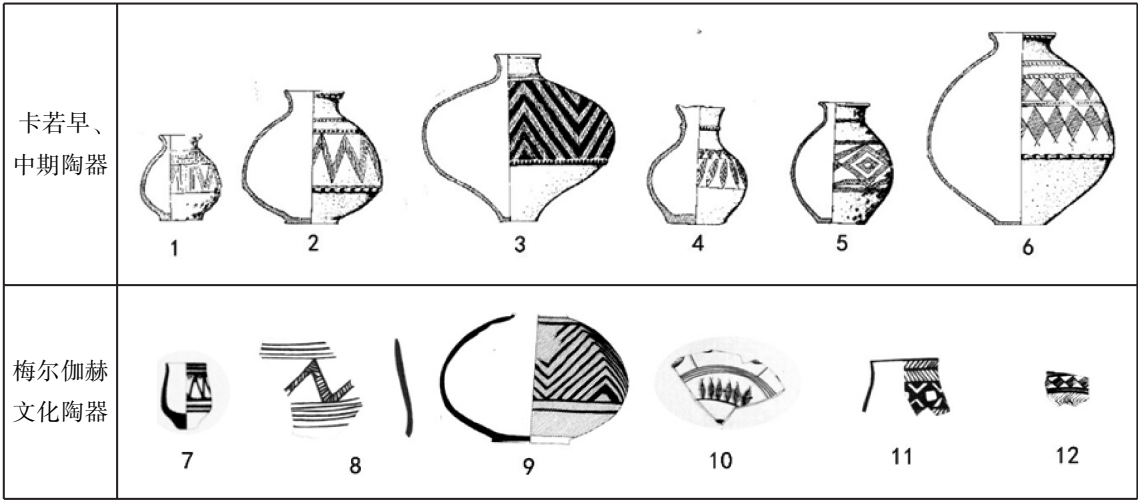
卡若文化中常见的刻纹三角折线纹、菱形纹从早期就已出现,发展到中期达到鼎盛期,装饰手法更加繁复,其间多填斜线、纵线和剔刺线纹,到晚期不再流行。反观马家窑文化,三角折线纹、菱形纹是从半山类型中期开始出现的,到马厂类型中期达到巅峰。马家窑半山类型年代为距今2655-2330年^{[9]301},其年代上限明显比卡若文化中期公元前2850年要晚,而与卡若文化晚期大致同时。也就是说,卡若文化陶器上的三角折线纹、菱格纹刻纹要早于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是流而不是源。事实上,我国内蒙古中南部仰韶文化海生不浪类型和西辽河、冀中北地区的雪山一期文化也发现有三角折线纹、菱形纹彩陶,海生不浪类型为公元前3500至前3000年,雪山一期为公元前3600至前2900年^[10]。很明显,它们与马家窑半山类型之间存在年代缺环,距离上又与卡若文化相隔太远,三角纹、菱形纹的出现时间也不比梅尔伽赫文化早,不太可能影响到卡若文化。

如果我们将视线转向南亚俾路支斯坦的梅尔伽赫文化,不难发现卡若文化陶器上刻划的三角折线(图一,1)、上下叠置的波折纹(图一,3)、菱形纹(图一,6)、回纹(图一,5)分别在梅尔伽赫文化Ⅲ期(图一,12)、Ⅵ期(图一,8、11)、Ⅶ期(图一,9)彩陶上均可以找到相似的图案。值得注意的是,卡若彩陶的叶脉纹在半山类型中极为罕见(图一,4),却是梅尔伽赫文化Ⅵ期、Ⅶ期非常流行的彩陶纹饰(图一,10)。虽然两者在表现方式上存在差异,但是图案母题却是惊人相似。回纹是马厂时期出现的新纹饰,尽管有诸多变体,但作二方连续状属于马厂偏晚阶段。梅尔伽赫文化Ⅵ期彩陶有在腹部上绘制二方连续的回字纹(图一,11),与卡若彩陶回纹表现手法相似(图一,5),皆为双线勾勒,两层相套。

(二) 衬花工艺陶器

卡若文化中有相当部分衬花工艺的陶器。这种衬花工艺制作的陶器完全可以和彩陶和磨光黑陶相媲美,是一种精品工艺陶器。它的制作方法一般是以压剔刻划为地纹,而不饰纹饰的磨光面作为主纹。这样,粗糙的地纹衬托出光滑的主纹,主纹和地纹之间对比更加突出,衬花的目的就达到了。卡若文化流行的衬花纹饰,一种是以填线的波折纹为地纹,有的在陶器主体部分绘一层波折纹,反衬出上下对出的光面三角纹(图一,2),还有的绘出多层的波折纹,表现出一种重重叠叠的效果(图一,3)。另一种衬花纹饰恰好与前者相反,是绘好一层波折纹后,在波折纹上下两端相对出的三角形中填以细划线,有划纹的三角形反衬出光洁的三角形主纹。还有的地纹勾出二方连续的菱形纹,内部刻划以直线衬出上、下两端的三角纹(图一,6)。这种陶器的衬花装饰工艺在四川、西藏和云南在内的西南山区新石器文化中有较多发现,而在中原地区较早的新石器文化中没有发现。虽然在内蒙古、辽宁诸多北方新石器文化

(内蒙老虎山^{[11]362}、辽宁大长山岛小珠山^[12])也发现有衬花陶,但衬花陶普遍盛行篦点纹,这些篦点纹多绘在盂、鬲等三足器上。可见,北方的衬花陶在表现方式和绘制部位上与卡若文化迥然有别。我国东南地区良渚文化陶器上也发现有衬花工艺,但采用复式衬法,与卡若文化的衬花陶属于不同的工艺传统。王仁湘先生指出,西南地区的衬花陶技法起源于彩陶。他列举出三个证据,一是有的衬花陶有加彩的现象,二是有的衬花陶与彩陶图案在构图上相似,三是衬花陶的时间晚于彩陶^[13]。此说颇有道理。如果说衬花陶技法起源于彩陶,那么卡若衬花陶的具体源头在哪里呢?我们认为这个源头可以从毗邻西藏的南亚次大陆去找。彩陶从梅尔伽赫文化Ⅲ期已出现,至Ⅵ期、Ⅶ期达到鼎盛期。用细密的线条填出纹以外部分的装饰手法(图一,8)在梅尔伽赫Ⅵ期、Ⅶ期颇为常见,且多绘制于罐、瓶类的腹部。其中Ⅵ期的一件彩陶腹部绘一层波折纹,内填绘直线纹(图一,8),这与卡若遗址的衬花陶波折纹(图一,2)的构图几乎一模一样。不仅如此,梅尔伽赫Ⅲ期还出土了以填线菱形纹为地纹的彩陶(图一,12),比卡若菱形刻纹陶 F8:116(图一,6)要早。尽管梅尔伽赫文化发现的重叠波折纹地纹是颜料绘制的,与卡若以刻划表现地纹的方式有别,但表现部位和图案是基本一致。也就是说,卡若文化衬花陶工艺技法的源头很可能来自南亚梅尔伽赫文化的彩陶。



图一 卡若早、中期刻纹陶与梅尔伽赫陶器纹样比较

1~3、7~9. 三角折线纹(卡若 F17:86、F8:150、F8:5、梅尔伽赫Ⅵ期、Ⅶ期) 4、10. 叶脉纹(卡若 F8:66、梅尔伽赫Ⅵ期)
5、11. 回纹(卡若 F17:83、梅尔伽赫Ⅵ期) 6、12. 菱形纹(卡若 F8:116、梅尔伽赫Ⅲ期)

(三) 海贝饰品

卡若出土了子安贝(Cowrie Shell)十枚。发掘者童恩正先生认为:“此类贝主要产于南海,但在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以及黄河上游诸石器时代文化中,经常可以发现以宝贝作为装饰品的情况,这似乎是我国原始文化的共同特征之一,所以国外有的学者是以宝贝的传播作为一种文化因素的传播而加以考虑的。卡若遗址远离南海,竟然也发现了这种贝,这除了证明它的居民与我国其它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居民有着共同的意识以外,也反映了当时部落之间的交换,不论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已经达到了很远的范围。”^{[8]154}也就是说,童恩正认为卡若的海贝可能是不同人群通过交换的方式从中国南海传播而来。据报告所述,卡若出土的海贝为宝贝(Cowrie Shell)。此宝贝属腹足纲宝贝科,背部高隆有环纹,腹部中间有齿形沟槽,日本学者称之为“子安贝”^{[14]112}。有不少学者认为此类海贝来自印度洋深海水域,而非南海。近年来的海洋动物学研究表明海贝只适应生活在印度洋这样的暖水海域,南海的温度较印度洋低,不适合海贝的生存^[15]。从新石器墓葬到殷商、西周墓葬,海贝作为随葬品就颇为常见。从目前出土资料来看,海贝进入中国的时间不超过新石器时代晚期。事实上,过去认为仰韶文化出土了海贝,但在后来的发掘中并没有见到^[16]。海贝在西南地区的其他新石器文化中虽也有零星出土,但除了岷江上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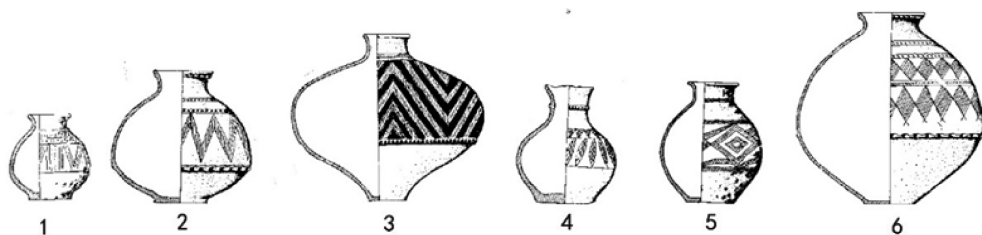
理县箭山寨出土的1枚海贝^[17],与卡若文化年代相当外,其他诸如云南发现的海贝皆晚于卡若文化。由此可见,卡若文化出土的海贝,包括马家窑文化,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海贝。到了殷商时期,我国西南地区发现的海贝数量剧增,四川三星堆遗址^[18]以及云南大理鳌凤山、江川李家山、呈贡天子庙^[19]等出土的海贝少则千枚,多则上万枚。我们将这些海贝出土地点连接起来,不难发现我国西南地区出土海贝传播路线与古代南方丝绸之路大致吻合,有学者还拟定出从四川到云南最后到南亚的传播路线^[20]。

从现有的出土资料来看,卡若文化中的海贝可能并非经古代南方丝绸之路辗转而来。云南海贝的年代最早也不过殷商之际,比卡若文化晚两千多年。南方丝绸以使用海贝为链环的贸易圈到商周时期才初具规模。也就是说,新石器时代西南地区发现的海贝还应当考虑其他通道。我们认为最有可能的一条通道是西藏通往南亚的道路,即喜马拉雅山廊道。梅尔伽赫文化I期墓葬中就出土了贝壳垂饰以及贝壳制的项圈等装饰品,用海贝作为装饰品流行于各个时期。报告认为这些海贝均不是当地产物,而是产自印度洋的马尔代夫诸岛,经孟加拉湾传入俾路支斯坦。值得注意的是卡若文化出土的10件海贝均有穿孔,有的孔在贝中部,有的在贝两端。梅尔伽赫文化在海贝加工技术方面有着悠久的传统,穿孔海贝的流行时间从公元前六、七千纪一直延续至前哈拉帕期。换言之,梅尔伽赫文化是南亚地区最早加工和使用海贝的新石器文化。数量巨大的海贝和精细的加工技术使这里成为新石器时期南亚地区制作海贝的中心。在南亚,海贝远播至北端的克什米尔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古夫克拉遗址就出土了零星的穿孔海贝。克什米尔地区作为南亚次大陆与青藏高原实现远距离文化交流的连接点,是喜马拉雅山廊道上的重要一环。古夫克拉遗址作为克什米尔地区非常重要的新石器文化,无疑受到了俾路支斯坦梅尔伽赫文化传统的直接影响^{[21]46}。那么,克什米尔新石器文化与卡若文化以及梅尔伽赫文化是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三、克什米尔地区新石器文化与卡若文化的联系

克什米尔地区新石器文化见于克什米尔河谷,这里有两个重要遗址——布鲁扎霍姆(Burzahom)和古夫克拉(Gufkral)遗址。布鲁扎霍姆位于首府斯利那加(Srinagar)东北方向16公里,该遗址文化层分为三层,分别代表不同的文化时期,一期甲段为公元前3000~前2850年,一期乙段为公元前2850~前2550年,一期丙段为公元前2550~前1700年。古夫克拉位于斯利那加西南41公里处,新石器时代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年代在公元前2400~前1600年^{[22]111}。这两个遗址出土了不少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相似的遗迹,如半地穴式房屋、穿孔石刀、带倒刺的鱼叉、骨椎、用狗随葬的习俗等^[23]。不仅如此,这两个遗址出土的遗物与卡若文化也有诸多相似之处。

卡若文化常见的穿孔石刀虽然不见于梅尔伽赫文化和哈拉帕文化,但在克什米尔地区,它不仅出现在克什米尔河谷,还出现在斯瓦特河谷的新石器文化中。除了布鲁扎霍姆和古夫克拉文化外,穿孔石刀在比尔龚代遗址(Bir-kōt-ghundai)^[24]、卡拉克·德日(Kalako-deray)^[25]遗址中也有发现。值得注意的是,卡若穿孔石刀中有一种凹背弧刃刀,器身呈新月型,刃开在弓背部。这种凹背弧刃的穿孔石刀是我国西南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共同特征,与华北地区半月形石刀刃开于弓弦的做法迥异。事实上,我们在布鲁扎霍姆一期丙段(图二,5)、古夫克拉IC期发现了这种凹背弧刃的穿孔石刀,形制与卡若文化基本一致。甚至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锡金北部强古地区(Djangu area)^[26](图二,4)我们也发现了凹背弧刃穿孔石刀。纵观其出现时间,斯瓦特河谷(距今1700~1400年)稍晚于克什米尔河谷的出现时间(公元前2000~前1600年),但出现在卡若遗址的时间可早至公元前3000年。也就是说,穿孔石刀的传播很可能从横断山区西部逐渐翻越喜马拉雅山山口或者稍晚向南由缅甸传播至南亚次大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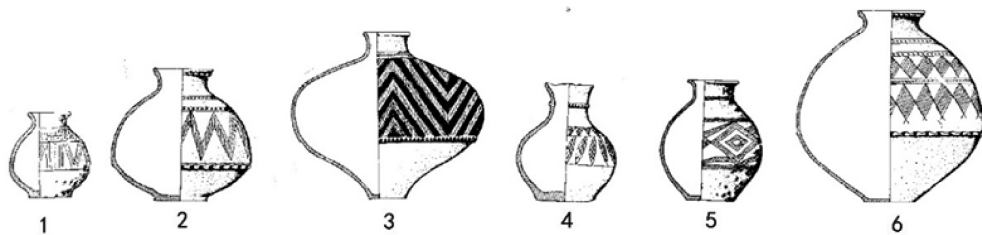
图二 卡若与南亚西北新石器文化出土穿孔石刀比较

1. 古夫克拉 2~3. 卡若遗址(F17:77、T61④:88、F19:21) 4. 古强地区 5. 布鲁扎霍姆 7~8. 卡拉克·德日

布鲁扎霍姆文化与卡若文化在陶器方面亦有诸多相似点。两者都出土了罐、盆、碗(钵)为主体的陶器组合,都流行在陶器折卷边口沿装饰压印纹和附加堆纹,在底部印以席纹。这种底部印以席纹的陶器最早见于梅尔伽赫文化,有可能是陶器制作好后事先摆放在篮子中的,但并非所有的陶器底部都印有席纹,仅有小部分陶器的底部才有。因此我们更倾向认为这是一种独特的陶器装饰习俗。另外,卡若文化的陶器在容器表面常见一种不规则的抹刷纹,占陶器总数的7.8%,抹纹粗细不匀,交错或衔接部位重叠的较多,可能是在制陶过程中用粗纤维或草抹刷器表留下的。这种抹刷纹也见于布鲁扎霍姆文化的陶器器表。

在骨器方面,克什米尔地区新石器文化和卡若文化都有相似的骨筭。卡若出土了5件骨筭,通体磨光,顶端雕成重迭的蘑菇状(图三,1),这显然不同于中原仰韶文化晚期常见的T字形骨筭^{[27]581},而与斯瓦特河谷的比尔龚代遗址^[24](图三,2)和洛伊班Ⅲ^[28](图三,3)发现的骨筭非常接近。

从饰品来看,卡若文化发现一种玉珠,其形状呈一端尖、另一端圆的弧形,孔位于圆端,形状类似于逗号(图三,4)。在克什米尔地区古夫克拉 I C 期、加利盖第 15 层^[29](图三,5)、洛伊班Ⅲ期^[28](图三,6)中也出土了此类逗号形玉珠,但与卡若的开孔位置不同,孔开在尖端。沃森(W. Watson)认为在日本、韩国史前墓葬中也有此类玉珠的发现,但其原型应来源于中国的新石器文化^{[30]171}。翻检我国新石器文化资料,逗号形玉珠最早出现于东北辽东半岛的郭家村下层文化,距今 6000~5000 年^[31]。卡若文化出土的两件勾形珠形状与郭家村的勾玉相似。也就是说,卡若的逗号形玉珠很可能受到了北方新石器文化影响,并传播至克什米尔地区。古夫克拉 I C 期出土 1 枚子安贝,报告认为其与逗号形玉珠、玛瑙等作为护身符(amulet)挂于颈部之用。由此可见,横断山区与南亚次大陆西北部的文化联系是双向的,不存在单向的流动,人员的流动、物品的交换都促使了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



图三 卡若与南亚西北部新石器文化出土装饰品比较

1~3. 骨筭(卡若 T12④:148、比尔龚代 BKG⑩:81、洛伊班Ⅲ) 4~6. 逗号形玉珠(卡若 F22、29:200、加利盖、洛伊班Ⅲ)

布鲁扎霍姆遗址出土了一件头盖骨,根据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其属蒙古人种,为 50 岁左右的男性,被埋在离居住区较远的墓地^{[22]161}。换言之,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与南亚西北部的文化交流通道是确实存在的。

四、结语

我国西南山区新石器文化与南亚次大陆的新石器文化有着诸多相似的文化因素,这种相似性绝非

是巧合,而是不同文化碰撞、融合的结果。卡若遗址中存在的梅尔伽赫文化因素,恰好说明了卡若文化并非我国西南地区独立发展而来的新石器文化,南亚西北部新石器文化对它产生了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次要的,间接的,远不及甘青地区的文化影响强烈,原因很可能是文化的传播受到喜马拉雅山的阻碍,传播的通道并不十分畅通。这种文化的传播不太像是人群的替换或是文化的征服,而更像是长时间的、远距离的贸易造成的物品交换。

梅尔伽赫文化很可能是由巴基斯坦西北俾路支高原经克什米尔,沿班公湖一带南下西藏昌都^[32]。值得注意的是,西藏腹地曲贡文化在石器上有意识地涂赤铁矿不能不说是梅尔伽赫文化传统的一种扩散。因为从中国范围看,石器涂红现象极为罕见。除了横断山区的哈休遗址^{[33]295}、西藏山南的邦嘎^[34]和昌果沟遗址^[35]外,虽然在我国其他新石器文化如江苏新汀花厅^[36]、安徽潜山薛家岗遗址^[37]中也曾发现,但毕竟与我国西南地区的关联远了些。事实上,梅尔伽赫文化从I期就出现了在石器上撒铁矿粉的现象,克什米尔古夫克拉IA期也有在石斧上撒赤铁矿现象,这无不受到梅尔伽赫文化的影响。石器上撒赤铁矿的传统在南亚一直延续至哈拉帕时期,并经过克什米尔地区对我国西南山地的新石器文化产生影响。另一方面,由克什米尔地区新石器文化与卡若文化密切的关系也可看出喜马拉雅廊道是连接我国西南地区与南亚次大陆的重要纽带。

[参 考 文 献]

- [1] 童恩正. 西藏考古综述[J]. 文物,1985(9).
- [2] 霍巍. 喜马拉雅山南麓与澜沧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农业村落——兼论克什米尔布鲁扎霍姆遗址与我国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农业文化的联系[J]. 农业考古,1990(2).
- [3] Giorgio Stacul. Pit Structures from Early Swāt[J]. East and West,1996,46(3/4).
- [4] 吕红亮. 跨喜马拉雅视角下的西藏西部新石器时代. 考古[J],2014(12).
- [5] M. R. Mughl. "Excavation at Jalilpur"[J]. Archaeology,1972(8).
- [6] Catherine Jarrige. Mehrgarh Field Reports 1974-1985 from Neolithic times to the Indus-Civilization[M]. Sindh: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1995.
- [7] 王仁湘. 关于曲贡文化的几个问题[M]//四川联大西藏考古与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西藏考古(第1辑).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
- [8]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 昌都卡若[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 [9] 考古学编辑委员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 [10] 韩建业. 半山类型的形成与东部文化的西迁[J]. 考古与文物,2007(3).
- [11]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岱海考古(一)[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 [12] 辽宁省博物馆等. 长海县广鹿岛大长山岛贝丘遗址[J]. 考古学报,1981(1).
- [13] 王仁湘. 西南地区史前陶器衬花工艺探讨[J]. 四川文物,2008(1).
- [14] 白川静著,张莉译. 白川静文字学的精华[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
- [15] Bin Yang. The Rise and Fall of Cowrie Shells: The Asian Story[J].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2011(1).
- [16] 汤惠生. 再论卡若、曲贡等西藏史前遗址的相关问题[J]. 藏学学刊,2014(1).
- [17] 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组. 四川理县考古调查简报[J]. 考古,1965(12).
- [18] 张善熙,陈显丹. 三星堆文化的贝币试探[J]. 四川文物,1989(1).
- [19] 王大道. 云南出土货币概述[J]. 四川文物,1988(5).
- [20] 周志清. 浅议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贝[J]. 武汉文博,2011(3).
- [21] (巴基斯坦)艾哈默德·哈桑·达尼著,刘丽敏译. 历史之城塔克西拉[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 [22] A. K. Sharma. Early Man in Jammu Kashmir&Ladakh[M]. Delhi: Agam Kala Prakashan,2000.

- [23] 徐朝龙. 喜马拉雅南麓所见的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因素——浅谈克什米尔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布鲁扎霍姆[J]. 农业考古, 1988(7).
- [24] Giorgio Stacul. Excavation at Bīr-kōt-ghundai (Swāt, Pakistan)[J]. East and West, 1978, 28(1/4).
- [25] Giorgio Stacul. Kalako-? eray, Swāt: 1994 and 1996 Excavation Reports[J]. East and West, 1977, 47(1/4).
- [26] Sharma. A. K. . Prehistoric Explorations in Sikkim[J]. Puratattva, 1981, (10).
- [27]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6.
- [28] Giorgio Stacul. Dwelling-and Storage-Pits at Loebanr III (Swāt, Pakistan) 1976 Excavation Report[J]. East and West, 1977, 27(1/4).
- [29] Giorgio Stacul. Excavation near Ghālīgai (1968) and Chronological Sequence of Protohistorical Cultures in the Swāt Valley[J]. East and West, 1969, 19(1/2).
- [30] W. Watson. Cultural Frontiers in Ancient East Asia[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71.
- [31] 辽宁省博物馆. 大连市郭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J]. 考古学报, 1984(3).
- [32] 俞方洁, 李勉. 新石器时代甘青地区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以马家窑与梅尔伽赫文化关系为例[J]. 中华文化论坛, 2018(4).
- [33]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等. 四川马尔康县哈休遗址 2006 年的试掘[M]//四川大学博物馆, 南方民族考古(第六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 [34] 格旺堆. 邦嘎新石器遗址的考察及考古发掘[J]. 中国西藏, 2001(4).
- [35] 刘景芝. 西藏贡嘎县昌果沟新石器时代遗址[J]. 考古, 1999(4).
- [36] 南京博物院新沂工作组. 新沂花厅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概况[J]. 文物参考资料, 1956(7).
- [37]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 潜山薛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J]. 考古学报, 1981(3).

The Cultural Connection between Southwest China and South Asia in Neolithic Age

Yu Fangjie Li Mian

(1. Department of Basic Course Education,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Chongqing 401331;

2. College of History and Society,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47, China)

Abstract: Southwest China had cultural exchanges with the northwest subregion of South Asia in the Neolithic Age.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cultural interaction among Karuo in Tibet and Mehrgarh in Baluchistan region of South Asia, Bruzahom and Gufkral in Kashmir, it is found that the Karuo is closely related to Mehrgarh in terms of pottery carving, interlining technology, Cowrie Shell processing technology. Mehrgarh did not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Karuo. It penetrated into Tibet through the Himalayan corridor.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Karo and Neolithic culture in Kashmir showed the existence of thi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channel.

Keywords: Karo culture; Mehrgarh culture; Bruzahom culture; interlining pottery; Cowrie Shell

[责任编辑: 刘力]